

智库研究

高校智库：突出特色 发挥优势

□ 葛剑雄



当前,智库建设蔚然成风,如火如荼。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并将其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再次把我国智库建设推向新高度。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需要深入思考。

高校智库一定要坚持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智库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我国高校智库是国家的智囊团、思想库,高校智库建设首先要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多提供对国家当前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当然,学校和学者都需要处理好学术成果和智库成果的关系问题,例如纯粹的理论性研究就不应冠以智库成果之名。对高校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建设智库不是为了获取名誉、提升排名,而是真正从国家的战略需求出发,肩负起资政建言的使命。

高校智库要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高校智库研究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针对某个领域的专题式研究,提供的多是实证类成果、研究报告等,这类成果往往需要投入较多时间精力,适合于中长期战略性问题研究;另一种是利用高校的学术资源和人才优势把一些本身基础扎实的研究转化为短平快的智库成果,可以是思路性、纲领性的报告、建议或提示等,学理性不一定强,但能够切合当前国家需求,为国家解决切实问题。这需要发挥高校优势,多学科多角度地开展研究,提供决策思路。当前国家的经济问题、外交问题等,都是高校智库应当聚焦的方向。

高校智库要遵守“智库职业道德”。智库参与者要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出于公心来进行相关研究,而不是通过智库来满足一己私利。智库成果不同于个人的学术成果,比如多数重要的战略性研究需要保密,即使成果被采纳,个人也不能轻易使用,有时甚至不能证明这是自己的成果,这就是我国知识分子以国家利益为重具体体现。高校智库在建设过程中,要接受我国智库的规则,遵守“智库职业道德”。

高校智库要进一步畅通资政渠道,建立信誉。高校智库的首要功能是资政,一方面,政府应该同政府建立畅通的渠道;另一方面,智库各部门也要为迎接智库时代做好思想和机制准备。除了建立渠道以外,还需要建立智库信誉。智库若能够很好地为国家解决亟须的问题,就有可能被国家和相关部门倚重,其决策影响力也就随之建立起来。除了上报机制,高校智库建设还需要有反馈渠道。当前,内参的采纳、领导的批示因为国家密级规定,基本上不能与作者本人见面。事实上,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前提下,让智库研究者本人了解批示内容,有利于智库研究者下一步研究,避免盲人摸象。

高校智库建设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共享数据库。现在的智库建设存在重复劳动现象。尽管智库的相当一部分战略研究成果需要保密,但智库需要的研究数据和资料基本上都是公开的,例如美国兰德公司所使用的研究材料大多都是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的。高校智库建设应避免重复劳动,通过共享国际上大数据平台的研究数据,实现高效与节约相结合,也可以考虑由国家统一建设一批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数据共享。例如复旦大学的社会科学数据平台、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都是公开共享的。此外,当前高校智库建设不只要跨学科,还要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这样才能在研究上带来创新和突破。

高校智库人才需要发掘引导和政策支持。对于高校智库人才,需要“慧眼”来发现、引导。智库建设需要有领军人物,也要有优秀的组织者。很多学术成果本可以转化为决策咨询建议,但由于研究者自身缺乏自觉性、缺少沟通渠道,往往错失良机,造成资源浪费。因此,高校智库人才需要发掘和引导。智库人才不必讲资历,比如有些目光敏锐、信息灵通的年轻人,虽然资历不深,但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家和政府的需求,应当支持和引导其参加到智库中来。现在智库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较为集中,其实人文、理工科中也有部分研究可以转化为决策咨询成果,应该鼓励该领域学者积极参与智库建设。当然,对于智库人才培养,还需要学校提供政策支持,以免影响正常的职称评定和绩效评价。

总之,高校智库建设要努力发挥优势,避免重复建设,抓住要害,突出特色,进行前瞻性研究,用过硬的研究成果建立智库信誉。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热点关注

编者按:
创新,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5月18日—20日,以“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为主题的“20国智库论坛”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美国、法国、中国、巴西等20国的智库代表百余人参加论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参会并发言,既直言当前全球创新的“结构性梗阻”之困,又前瞻中国在全球创新中的巨大潜力,倡导实现从国家创新体系到全球创新体系的突破与转变。5月22日,以“气候金融”为主题的千人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王文再次与会并发言。

多次参与世界智库聚会,王文对全球智库交融激荡中的中国智库角色有了更深体认。本版特刊发其在“20国智库论坛”上的发言及作者手记,期待更多中国智库站上世界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1 世界经济呼唤全球创新体系

1 世界经济呼唤全球创新体系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沉重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均提高了创新的战略地位,希望借此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整体竞争力、走出经济危机。为此,世界各国的研发投入不减反增,不断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并给予多项优惠政策,使创新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正如世界各国期望的那样,创新可以推动世界经济从危机中恢复增长并且更具包容性。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艰难复苏之中,一方面,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无法实现实质性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

2015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仅为0.6%,比去年的预测值下降0.2%;欧元区在2015年陷入通缩困境的概率为30%左右,陷入衰退的概率接近40%。欧元区南方国家欧债后遗症严重,每个地区的潜在增长低迷,拖累了欧洲经济复苏;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增长压力较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新兴市场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至4.4%,下调2015年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至4.0%,但维持中国2014年GDP增长预期在7.4%不变。

如何化解世界经济增长疲态?一是通过世界再平衡收敛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储蓄缺口,例如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提高消费率;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找到像互联网这样可以带来革命性突破的技术,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

题为《专利在中国II:中国创新活动的现状与未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003—2009年间,中国的专利总量年增长率为26.1%,而美国的年增长率为5.5%;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示,2011年中国约提出52.6万件专利申请,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国。

众所周知,只有当参与研发的社会资源基数巨大并形成社会上最重要的产业时,才能产生稳定而连续的技术进步流,才能支撑起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且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拥有更大的创新原动力。

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焦点集中于“标准掌握在谁手里”这一问题上。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产业升级,其主要含义并非只是从落后工艺升级至先进工艺,更是要掌握标准的制定权。然而,制定新标准却绝非把既有环节重新排列组合,而是要依靠自身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对西方知识产权话语权形成挑战。为此,需要世界构建更加和谐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创建有利于全球创新合作的良好环境。跨国公司对整个产品价值链的掌控能力较强,阻断了知识的国家化及人员的国际化,常通过收购来消灭对手。为此,必须打破跨国公司的这种掌控能力;同时要协调各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改进新技术的传播渠道,创造有利于全球创新的环境。

创建有益于全球创新合作的基础设施。构建完善的全球创新合作金融支持体系,保证相关创新项目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明确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技术的商业化转化过程;修改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WTO政府采购协议、TRIPS协议、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等国际规则,使当前的全球规则促进全球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2 中国成为全球创新潜力最大国家

目前,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生产过程的特点,是围绕产品标准在全球配置资源,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生产与组合。在这一生产架构中,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在极少数国家手中,大多数生产者只是扮演落实这些标准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日趋复杂化的“交叉授权”形成了庞大的共享“专利池”,又从“专利池”中塑造出许多不断升级的标准体系,进而对标准本身进行专利化,以无形的知识产权链条控制了有形的全球化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草案)》,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会随着保护对象的位移而扩张,随“嵌入”到产品的零部件而自动将权利“嵌入”到使用国,于是,拥有较大“知识产权集群”的国家实际上可通过

修改国内法律法规影响别国利益格局。西方国家不愿放弃知识产权法权,并通过这种法权压制新兴国家的创新,导致全球创新体系进入了“结构性梗阻”状态。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制造成为现实,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但未能获得相应的利润。以生产苹果手机为例,每生产一部手机,中国从中拿到的利润大约为7美元,绝大部分利润都被美国公司拿走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控制了产品的核心标准,并把这些标准申请为专利,利用强大的全球信息网络,把研发、生产过程全部模块化,外包到全球各个角落。

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设计能力正逐渐向中国转移。2010年10月11日,汤姆森路透集团在

3 从国家创新体系到全球创新体系

全球化时代,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再局限于自身有多少人才、专利或其他要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并为己所用。

当前,世界知识产权体系仍由欧盟、美国、日本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主导,广大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尽管日益成为创新主体,却仍处于被支配地位。为此,需思考如何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为建立全球创新体系。

仅靠一国之力,难以突破全球“创新梗阻”。为此,必须建立全球创新体系,使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相互支持,共促发展。首先,要搭建好全球创新环境和创新基础设施。只有以二者为基础,才能培育出全球重大创新,形成需求、研发、生产、消费的完整的全球创新体系,并为之创建包括中介服务、金融

服务、产权保护、政治环境、社会文化氛围在内的服务体系;其次,必须站在全球角度构建新的标准,而不是把一国标准推广到国际市场。

在新的全球创新体系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肩负人类重大创新使命,也共同制定产品标准,从而使产品利润的全球分配更加合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促进这一体系的建立,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设立全球创新项目库,开展全球合作。各国政府应协商建立全球创新项目库,制定统一的科技合作协定,并在这些协定下执行科技合作项目,使相关国家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参与其中。这种官方合作方式,解决的往往是全球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作者手记

中国智库,为全球治理担起更多责任

在巴黎,我感到有些孤单。联合国、世界银行高层领导均参加的巴黎“气候金融日”大会,能容纳13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我却看不到一张除我之外的中国面孔。我被安排在最后一组最后一位主旨发言,阐释中国在促进发展与追求低碳方面的努力,直言欧美需要在气候金融上获得中国支持,我的发言得到了多位学者及气候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认同。

在柏林,来自二十国的百余名智库代表就目前创新困境、新技术转移、国际公共政策的障碍等议题讨论了三天,形成国际共识后,递交给今年G20峰会的土耳其秘书处,最终有可能融入二十国领导人共识,形成全球认可的国际规范。我在开幕式上作了主旨发言。可惜,在与中国利益相悖的议题争论上,我显得形单影只。

我曾几次问会议主办方,为何不多邀请中国代表?总结起来,原因大体有三:一是中国学者

不易请;二是在全球治理领域,擅长并感兴趣的中国智库学者仍然较少;三是主办方担心中国学者会表达与会议主旨完全相悖的看法。

我咀嚼着这三个理由,有一定道理,却未必都对。中国智库学者总体上非常愿意与世界交流,但可能由于英语能力、国际表达方式等方面的欠缺,在多边思想交流场合容易“失语”或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虽然中国不乏非常优秀的智库专家,但中国智库总体上仍缺乏与国际社会足够的、频繁的思想交流。

世界正在进入全球治理时代。双边国家竞争与博弈固然重要,但体现一国综合实力的关键,不只是经济、军事实力的超越,更是在全球治理层面的思想贡献与规划设计。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罗马等城市,几乎每周都有与全球治理相关的大型国际性论坛。中国智库不应只重视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等几个享誉全球的国际多边思想交流平台,还应到更多的国际平台上频繁发声。在中国进入“智库时代”的今天,中国智库在国际参与和全球思想贡献方面有待真正崛起。这是值得政府、社会、智库机构、智库学者共同探讨的大课题。

会议传真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日前举办第71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专家发言要点如下: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财政改革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管理到治理,内涵有重大区别。管理是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架构,而治理更多强调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平面展开的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在轨过程中把释放和自我管理、组织和自组织结合在一起,进一步释放潜力和活力。二是资源配置问题,要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尊重市场、认识市场,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同时政府

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三是现代财政制度。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处理的“以政供财、以财行政”必然影响整个资源配置优化,因此,把财政改革作为整个配套改革推进的重头戏,有深刻的道理。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我想用四个关键词表达看法:大不相同、卡脖子工程、半拉子工程、拖泥带水工程。

大不相同,是指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角色和使命与以往的财税体制改革不同。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把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其用意在于要以财税体制改革破题,以现代财政制度

的建立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铺平道路。

谨防卡脖子工程。当间接税减少和直接税增加不能同步进行时,可能出现“卡脖子”情况。有两方面情形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因为“卡脖子”而不得不放权;二是如果营改增按计划全面推进,财政收支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谨防出现半拉子工程。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预算法有诸多进步。要让预算改革真正落到实处,还得着力在非一般公共预算的全面规范和公开透明上投入更多气力。

谨防拖泥带水工程。随着营改增的推进,究竟下一步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收入如何划分,还是未知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灵魂和核心内容。但目前部署还停留在原则性层面,很多内容亟待具

体化、明晰化。

梁云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未来的税收制度改革应该兼顾税收的聚财和调节功能,以优化税收结构为主线,在降税清费的基础上健全税率体系。建议在降税清费的基础上构建地方主体税;根据我国国情,由中央确定一个大致的税率比例幅度,地方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适当调高或者调低税率,并在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的基础上完善税收管理体制和地方税制结构。(王月整理)



(了解更多《智库》周刊内容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智库》周刊公众微信号。欢迎留言、探讨。)